

文明敘事下政治修辭——從魯比奧雅典演講看當代回響

各國鼓吹「文明」身份 勢成國際衝突根源

●魯比奧在演講中將美國定位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。網上圖片

10月7日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登臨希臘雅典普尼克斯山，以古老的帕特農神廟遺蹟為背景，發表一篇關於西方文明將往何處去的演講。魯比奧選擇此地發表此番演說，用意不言自明。這片古雅典公民集會議政之地，長久以來被塑造為西方文明與民主傳統的精神源頭。站在承載着古希臘城邦公共辯論記憶的遺址之上，他借這片土地厚重的歷史象徵，為整場演講賦予文明敘事的底色。

●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張浩

●民眾發起反美示威，聚集領事館外抗議。資料圖片

魯比奧從追溯古希臘文明開始，提出雅典孕育民主理念，柏拉圖、亞里士多德等哲人奠定西方哲學根基，城邦實踐塑造公民身份、法治與共和治理的思想，正是這些構成西方文明的精神源頭。但他指出，「我們正處在一個轉折點——不僅是我的國家歷史的轉折點，也是我們整個文明的轉折點。」未來的抉擇，將決定西方能否繼續保持世界領先地位，或是走向萎縮衰退。他認為，當下西方內部出現精神層面的自我懷疑，部分群體對自身文明歷史持否定態度。魯比奧援引古希臘城邦抵禦外敵的歷史，強調維繫文明存續，需要共同體擁有捍衛自身的勇氣與精神力量。魯比奧表示，根據古希臘人的理念，治國需要審慎和外交，當審慎和外交失敗時，就需要有使用武力的能力，「力量不只意味自衛手段，還要擁有動用力量的可信度」，「這就是（美國總統）特朗普政府希望重新奪回的古典政治與治國理解——不僅為我們的國家，也為我們整個文明重新奪回。」

將美定為西方文明集大成者

魯比奧在演講中將美國定位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，稱美國「生於雅典，受羅馬塑造，在基督教世界受洗，在中世紀歐洲的熔爐中淬煉，擁有英國人追求自由的天性，然後跨越大西洋，在新世界的海岸上重生。」因此，魯比奧也自然而然地以整個西方文明的代表自居，稱「現在戰爭再度降臨，大國競爭重燃，各類新風險、侵略行動與恐怖襲擊也隨之而來」，西方不能被動等待局勢演變，必須主動採取聯合行動，守住文明根基，避免文明走向衰落。他呼籲歐美各國重新凝聚共識，鞏固跨大西洋夥伴的集體認同，正視外部挑戰，摒棄內部分歧，稱「我們必須重建我們的制度和聯盟，共同面對這些威脅。」

然而，雅典高山丘上的演講並非個案。放眼全球，多個大國都在挖掘歷史文化資源，拿「文明」來說事。

土耳其俄羅斯重視構建自身文明

其中，近年來最受矚目的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。對內，他重新發掘奧斯曼歷史遺產，調和世俗共和國傳統與伊斯蘭文明根脈，喚醒國民集體歷史記憶；對外，則着力強化所謂「突厥文明」親緣敘事，在歐亞大陸四處認親。5月舉行的突厥國家組織非正式峰會上，埃爾多安



●魯比奧登臨希臘雅典普尼克斯山，發表一篇關於西方文明將往何處去的演講。網上圖片

在致辭中回溯突厥民族綿延數千年的歷史，指出突厥文明橫貫歐亞大陸，在歷史長河中為人類文明貢獻諸多成果，卻在近代長期被邊緣化。他強調，當前全球格局正在重塑，全球治理體系的不公愈發凸顯，這正是突厥世界重拾自身歷史主體性的時代機遇。埃爾多安宣稱，「突厥世界地處歐亞之間，天然擁有樞紐地位。我們不需依附任何一方，我們要依靠自身的力量，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。我們擁有廣袤國土、豐富能源資源、充滿活力的年輕人口。只要我們放下分歧、凝聚一心，攜手推進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安全全方位合作，突厥世界將在本世紀留下印記。」

俄羅斯也非常重視構建以「俄羅斯世界」為核心的文明敘事。在俄烏衝突爆發前的2021年7月，俄羅斯總統普京曾發表一篇《論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歷史統一》的雄文。文章開篇即提出，俄羅斯人、烏克蘭人、白俄羅斯人同根同源，共同起源於基輔羅斯，基輔是「羅斯諸城市之母」，三國共用同一段古羅斯文明史、東正教信仰與文化血脈。文章回溯千年歷史，梳理古羅斯共同體如何在外部勢力干預下逐步分裂，認為近代烏克蘭民族身份的塑造、現代烏克蘭國界的劃定，很大程度是近代地緣博弈與蘇聯時期國家建構的產物。文中強調，俄烏之間存在無法割裂的血緣、文化、精神紐帶，烏克蘭不是俄文明空間之外的國家。普京在文章中強調，烏克蘭唯有與俄保持夥伴關係，才有可能獲得真正主權；一旦烏全面倒向西方，淪為遏制俄的工具，將對這片土地上同源的文明共同體造成悲劇性傷害。這篇文章將俄烏關係從單純國家間的地緣議題，上升到文明共同體存續的層面，這篇文章成為闡釋「俄羅斯世界」敘事的綱領性文獻，也成為研究俄烏衝突根源的重要政治宣言。

此外，印度總理莫迪着力發掘古印度文明，將數千年文明傳承作為民族復興的精神底色；法國總統馬克龍多次闡釋「歐洲文明主體性」，試圖在歐美博弈之間守住歐洲獨立的文化與戰略空間。各國文明敘事價值取向差異巨大，底層邏輯卻高度趨同：就是通過歷史敘事來劃定文明共同體的邊界，依託文明認同渲染共同面臨的外部風險，從而重構陣營，將「古老文明繼往開來」的道義目標，轉化為對內治理、對外博弈的政治工具。

文明衝突：敘事陷阱還是現實風險？

冷戰落幕之際，哈佛大學學者亨廷頓曾在其著作《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》中拋出影響深遠的判斷：「新世界衝突的根本源頭，將不再主要是意識形態或經濟層面，人類巨大的分化與衝突的主導根源，將會是文化。」在亨廷頓的框架中，文明是人類最大規模的文化共同體，族群依託祖先、語言、宗教、歷史塑造身份認同；舊的意識形態陣營瓦解後，文明之間的斷層線，將成為未來國際矛盾的高發地帶。這一論斷自問世起便爭議不斷，不少歐美學者當即批評，它刻意放大文化差異，用預設的文明對立簡化複雜的國際博弈。但近年來全球政治舞台上此起彼伏的文明敘事，讓這套理論重新回到國際輿論的中心。

各國領導人關於文明共同體的表述雖各有側重，卻共用一套相近的敘事邏輯：以古老文明遺產劃定邊界，識別外部「他者」，將地緣競爭、安全挑戰上升至文明存續的高度。正如亨廷頓在書中所寫，「人們界定自我，依託血統、宗教、語言、歷史、習俗與制度；人們認同文化群體，只有知道自己不是誰，常常還要知道對抗誰，才能確認自我身份。」由此也引出一個關鍵追問：當下不斷浮現的文明對立，究竟是文明差異自帶的現實風險，還是政治家主動建構出來的敘事陷阱？

學者阿皮亞在其《認同的謊言》一書中強調：文明並非整齊劃一、內部同質

●民眾為捍衛自身「文明」發起反美示威。資料圖片

的實體，「將文化想像成封閉孤島，本身就是一則虛妄神話。」任何宏大文明內部，都容納有多元傳統、不同立場與持續不斷的辯論。西方文明內部始終存在分歧；突厥語國家之間，各自的歷史道路、社會制度也都差異顯著。政治家構建宏大文明敘事時，往往簡化漫長複雜的歷史，把國家博弈、經濟競爭、安全博弈壓縮成文明之間非黑即白的對抗。這類敘事政治目的十分明確。風險在於，此類敘事一旦反覆傳播、不斷強化，會反向重塑公眾認知，把原本想像中的文明區隔與文明對抗，用作社會動員的工具，製造衝突預期，推動預言自我應驗。

不同文明互通 彼此吸收養分

文明演進的常態，在於交流、交融與互鑑。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在《中西文明比較》中指出：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，過去已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。希臘學習埃及，羅馬借鑒希臘，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，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，而文藝復興的歐洲仿效拜占庭帝國。」歷史上文明走向繁榮的階段，是不同文明互通有無、彼此吸收養分的時期。

文明本身不會天然走向衝突；真正引爆對抗的，往往是大國權力博弈疊加刻意放大的文明身份。一些當代政治人物如魯比奧等，固然可依託文明符號喚醒文化自信，但若沉溺於文明對抗敘事，將世界切割為相互對峙的文明陣營，一旦預言自我應驗，難免會掉進亨廷頓理論預設的陷阱裏去。



浩海觀瀾

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站在雅典衛城之下，以西方文明源頭為敘事基座，發表了一場極具時代象徵意義的演講。在單極秩序褪色、全球權力格局重組的當下，這篇演講並非單純回溯古希臘的理性與探索精神，而是一次典型的文明主義政治動員：將「西方文明」塑造成擁有清晰邊界、固定本質，以及需集體捍衛的統一實體，以此凝聚跨大西洋盟友，在大國博弈中劃定「我們」與「他者」的分野，高呼「我們想要一起贏，我們必須一起贏」。

放在國際關係理論的視野下審視，這場演講恰好印證文明主義理論的核心論斷：文明並非客觀存在、邊界清晰的實體，而是一種社會想像，是政治精英主動建構、用來整合跨國家群體身份的敘事工具；文明本身不會天然衝突，將文明敘事轉化為對抗意識形態的文明主義，才是製造對立

文明敘事幻象與人類共同危機

張浩

的源頭。

冷戰結束後一些年裏，美國主導的單極秩序一度標榜「歷史終結論」，試圖把西方現代性包裝為人類現代化唯一標準答案。如今這一秩序正在褪色。全球各大文明板塊紛紛覺醒，各國開始跳出單一西方尺規，重新回溯自身歷史，尋找屬於文明、民族與國家的現代定位。但這種文明意識的復甦，並不必然走向碰撞與對抗。

從更長時段看，文明融合才是世界發展深層的長期趨勢。歐亞大陸上諸多古老民族如匈奴人、伊特魯里亞人、東哥特人等，並非徹底滅絕，而是在漫長交融與衝突之中，失去獨立語言與共同體身份，匯入更大的文明母體。文明認同也從來不是與生俱來、一成不變，它具有

高度可塑性與情境性，會隨經濟周期、外部安全環境發生漂移。就像俄羅斯民眾可以在「歐洲文明」和「歐亞文明」兩種敘事之間搖擺；哈薩克斯坦社會也能同時接納突厥文明身份與蒙古帝國記憶，實現多重身份並存。

當今時代，全球化持續推動物質、知識、審美與觀念流動，人類正共用愈來愈多全球性公共產品，既有物質層面的，也有精神文化層面的。就像《人類簡史》這本立足於全人類視角的歷史題材暢銷讀物，面向全世界所有讀者，而不去區分東方或西方的文明歸屬；其他如全球同步首發電子產品、時尚新品、年度流行色，更是跨越大洲、跨越文化圈，迅速進入各國普通人的生活。此外，全球衛星導航系統、

世界疫病監測預警網絡等，同樣是典型的全球公共產品。日趨完備的全球公共產品，不會因為文明身份的差異而不同，而是從各方面塑造全人類共通的感知、審美與知識框架，不斷縮短國家、民族之間的距離，溶解文明壁壘。

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，一些西方政治人物放大文明差異，構築「我們與他者」的文明分野，鼓吹「保衛西方文明」，甚至宣揚文明之間零和博弈。這種做法與文明交融的時代大勢背道而馳，其真實意圖值得警惕。同時需要看到，各國正共同面對一系列全球性危機，如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災害、新發傳染病的跨國傳播、人工智能技術失控的長期風險、核擴散帶來的生存威脅。這些挑戰顯然不是某方文明所能獨自應對的，在這些問題上，如果「我們想要一起贏，我們必須一起贏」，那這個「我們」豈能只是「西方」。